

十三經注疏

儀禮注疏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儀

禮

注

疏

〔漢〕

鄭玄

注

〔唐〕

賈公彥

疏

整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王輝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十三經注疏)
ISBN 978-7-5325-4890-3

I. 儀… II. ①鄭…②賈…③王… III. ①禮儀—
中國—古代②儀禮—注釋 IV. K89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08898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十三經注疏

儀禮注疏

(全三冊)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王輝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51.375 插頁 18 字數 1,529,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4890-3

K·1082 平裝定價: 160.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T:66511611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

張豈之 周天游

十三經是儒學的基本典籍，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影響至深至遠的重要文獻之一。在中國古代，堪與十三經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對這兩大文化支柱，無論是諸子還是詩文，其中雖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歷史舞臺的邊緣，難以撼動其中心的地位。

如果說二十四史是以記實爲本，縱貫古今，鑒往說來，宣彰資治，更多發揮的是實用的鏡鑒的作用，那末十三經則是整個封建社會的靈魂。自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設立五經博士，立於學官之後，直至清代，經學一直是歷代統治者製定國策的理論依據，是士農工商各色人等齊家立身的行爲規範。不僅如此，十三經還被法典化，於是有了「春秋斷獄」，「禮」成了「禮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於是儒學成爲國學、國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廣到所有官私學校之中，又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包括目不識丁之人在內的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的思想與行爲。所以每當社會發生重大變革之際，總有人視其爲障礙，爲糟粕，必欲除之而後快；相反，也有人尊之爲聖典，爲良方，藉其足以安邦定國。時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從這一意義上講，不了解十三經，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了解中國。特別是上世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之後，客觀上的確起到了振聾發聵、除舊迎新的作用，經學的地位開始一落千丈。然而正如在倒掉髒水的同時也倒掉了嬰兒一樣，十三經中的精華也同糟粕一道被棄置，殊為可惜。更為可怕的，其中的許多糟粕并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又往往借尸還魂，死灰復燃，為害社會。所以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對中華文化遺產更加珍視，開始呼喚讀經，呼喚科學的讀經，呼喚經學研究者在嚴謹的批判與借鑒中，讀懂十三經，使經學中的合理內核與有益營養，跟現代社會達到真正的和諧與交融，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正是基於此，我們才萌生出整理出版新版十三經注疏的最初願望。

「經」本指經綫，是布帛等織物的綱，並引申出提綱挈領、傳之久遠的含義。於是作為基本典籍常相傳授的書，便被稱作「經」。「經」本非儒家典籍所專有。最早被稱為「經」的書是墨經，也就是墨子。墨子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此外，管子、韓非子也稱為「經」。儒家之書被稱作「經」，也始於戰國，那就是「六經」。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又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湖北荊州郭店所出竹簡中所記「六經」經名與順序，證莊子所言不虛。這「六經」的順序保持到西漢前期。」

「六經」是夏商周三代禮制文明的結晶，大體成型於周代。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上下陵替。隨着周王室的衰敗，「六經」也失去往日的榮耀，被棄之不用。而諸子百家乘勢而起，為新興的貴族出謀劃策，

變法圖強。孔子尊崇周制，潛心整理「六經」，試圖恢復周禮所提倡的等級秩序，以平息紛爭，因逆潮流而動，便到處碰壁，甚至陷入「惶惶若喪家之犬」的境地。當時，儒學並非顯學，「六經」也不神聖。秦併六國，天下歸一。秦始皇以法立國，一度焚書坑儒，儒家又遭沉重打擊。幸賴秦博士所藏及民間所匿，於漢初衆經才得以復出，而樂經已亡，僅餘「五經」。漢武帝之時，國力達於極盛，新的統治秩序得以鞏固，赤裸裸的法治或清靜無爲的黃老之學無法滿足新秩序的需要，從此神學化的儒學脫穎而出，登上獨尊的國教地位。兩漢之際，「六經」順序有了微妙變化。漢書藝文志中六藝略所刊爲：易、書、詩、禮、樂、春秋。這順序沿用至今。而之所以有此改變，可能與劉向、劉歆當年整理文獻排列諸經成書年代次序有關。東漢時，加入了論語、孝經，除去已佚的樂經爲「七經」。唐時有「九經」之說，未見確論。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言，至唐文宗太和年間（八二七—八三五）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有了實指，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到了宋代，經、朱熹等理學家的推崇提倡，孟子進入「經」的行列，於是「十三經」始全。

「十三經」的成書年代，至今爭論不休。然而易經、尚書形成於西周；詩經始於西周而成於春秋；儀禮、周禮、禮記基本編定於東周，漢代有所變更；左傳、論語、孟子、爾雅成書於戰國；孝經古本完成於戰國，而改定於漢初；公羊傳、穀梁傳寫定於漢代，基本內容源出於孔子弟子之說，還是大體可信的。

中國經學的研究，從漢初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之久。西漢時期，今文經控制學壇。王莽代漢，古文經學抬頭。進入東漢，更一發不可收拾，經馬融、鄭玄等大家的推動，經今古文合流，但古文經處於上

風。魏晉學術爲之一變，玄學成爲顯學。而到了唐代，漢學重新流行，並以古文經爲基礎。宋時疑古之風大盛，理學一統天下，至明而不墜。清代則提倡樸學，輕虛言，重實證，追本溯源，漢學由是復興，經學研究也達到頂峰。那時相關著作，接踵問世，如納蘭性德匯刻之通志堂經解、阮元輯刻之皇清經解、王先謙輯印之皇清經解續編，動輒收書數百種，總卷帙超千卷，其他專著則數不勝數。當然影響最大、流傳最廣且久的，仍當推阮元主持修訂的十三經注疏。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卒，享年八十六歲，謚文達。據清史稿阮元傳所載，元博學淹通，早被知遇，勅編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再入翰林，創編國史儒林文苑傳。至爲浙江巡撫，始手成之。集四庫未收書二百七十二種，撰提要。」又曰：「歷官所至，振興文教。在浙江立詒經精舍」，「在粵立學海堂」。「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百八十餘種，專宗漢學，治經者奉爲科律。」

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始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刊成於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可謂神速。不過其準備工作則在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在浙江創辦詒經精舍之時，當時他糾集段懋堂、何元錫、顧千里、徐新田、臧在東、孫雨人、李尚之、嚴厚民等知名學者，分撰十三經校勘記，奠定深厚基礎，所以新本一出，倍受歡迎，享譽至今。

阮刻本雖稱善本，却並非無懈可擊，其存在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

一、選用底本不當。阮刻本以「重刻宋本」爲名，實際所用乃元刻明修之南雍本，此本雖原出宋季建刻附音本，遞經修補，續有糾譌，然轉相承訛之處多有，阮校因之失誤之例甚多，因此，實非整理首選。相反，始於南宋初年浙東茶鹽司刻本之周易、尚書、周禮三種，繼以紹熙中黃唐刻毛詩、禮記二種，因半葉八行，故稱八行本。而經注及義疏合刻始於是本，書名題有「注疏」之稱，亦始於是本，勘刻之精審遠在十行本之上。以周禮、禮記爲例，因十行本錯而八行本不誤，阮刻校勘記可以不出者，大約在三分之一以上。

二、分卷無例。如尚書依正義作二十卷，儀禮依正義作五十卷，而周易則依經注本作九卷，與正義作十六卷異。又毛詩也依經注本作二十卷，却非正義作四十卷之舊。或依或違，所爲無定，遂使唐宋義疏原卷不可得以詳。

三、主事者意見不合，各執己見，勢同水火，正確建議未能採納，而致謬種流傳。如顧千里與段懋堂之爭，事涉臧在東、何元錫二人，以至顧氏出走，爲張古餘刻儀禮注疏，以成己志。

四、急於呈送，校對未精。因阮元陞任兩廣總督，江西之盧宣旬以「創始者樂於觀成，板甫就，急思印本呈制軍，以慰其遺澤西江之意。局中襄事者未及細校，故書一出，頗有淮風別雨之訛」。(二)

有鑒於此，西北大學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發起，於一九九二年成立了新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的編纂委員會。編委會草擬了有關的方案與體例，並約請國內十餘名中青年才俊，參預點校整理工作。各經均追本溯源，詳加考校，或採用宋八行本爲底本，或以宋早期單注、單疏本重新拼接，或取晚出佳本爲底本，在盡量恢復宋本原貌的基礎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來彌補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對經學研究、對中

國傳統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動作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但由於種種原因，有關工作遷延至今，這是我們深為遺憾之處。

又當代缺乏經學大家，是客觀事實。今預役諸君各有特長，成果頗豐，但均有先天不足，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本項工作一直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二〇〇八年八月修訂

〔一〕參閱蔣伯潛十三經概論、楊伯峻經書淺談導言、周予同經學歷史序言、李學勤經史總說，下同，恕不一一注明。

〔二〕見朱華臨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載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四頁，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又參閱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載文史第三輯。

校點前言

儀禮是中國先秦時代有關禮制、社會習俗的節目總彙，也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的重要儒家經典。儀禮在漢代以前只稱爲禮，故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恭儉莊敬，禮教也。』」漢代則稱爲禮經、士禮或禮。史記儒林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傅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亦或稱爲禮記，鄭玄注詩采繁，引儀禮少牢饋食禮經文，而曰「禮記『主婦髮髻』」，是其證。

關於儀禮的成書經過，今已不能確知。通鑒外紀卷三引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六年制禮作樂。」禮記雜記下：「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有的學者因此認爲，儀禮最先作於周公，而由孔子最後刪定。如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開闢時代云：「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

「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爲三百篇，刪書爲百篇。不過這種說法並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多數人認爲，古禮來源甚早，但初始階段大多是由當時的知識份子口耳相傳，內容很複雜，即禮記禮器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作爲周初的大政治家，孔子作爲春秋末的大思想家、大學者，對古禮作一些增刪是可能的，但是否在他們手上寫成定本，並無確證。一般認爲，今本儀禮大約成書在春秋、戰國之際。

秦燹焚書，儒家經典多罹其難，儀禮亦未能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此後流傳不絕。漢文帝時，徐生及其孫徐延、徐襄都通禮經。史記儒林列傳云：「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恒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生焉。」漢書藝文志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又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據劉敞說，所謂「經七十篇」、「孔氏學七十篇」，均指今文經儀禮十七篇，「七十」乃「十七」之誤；所謂「禮古經」則指古文經，古文經中有十七篇與今文經十七篇「文相似」，即語句大體相同；另「多三十九篇」，則爲古逸經，即劉敞移讓太常博士書中所說的「逸禮有三十九篇」，今已不傳。戴德又稱大戴，戴勝又稱小戴，至此，禮分三家之學，皆立於學官。到了東漢，大小戴之禮學衰微，惟慶氏禮較盛行。三家禮的本子今皆不傳，不過大小戴本的篇目、排列順序仍保留在賈公彥疏所引鄭目錄中。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儀禮竹木簡四百

六十九枚，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二字，有甲本、士相見、特性、少牢、有司、燕禮、泰射、服傳、乙本、服傳、丙本、喪服共九篇。簡本篇目次序與大小戴不同，文字與今本也略有出入，據陳夢家、武威漢簡一書考證，簡本當是慶氏之禮，流傳時間在西漢末至王莽新朝時。

東漢一代，儀禮雖諸家傳授，有曹充、曹褒、曹鈞等，但已漸衰微。靈帝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蔡邕、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後漢書蔡邕傳），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熹平石經乃今文經，今多亡逸，唯宋洪适隸釋保存二千餘字，中有儀禮殘文四十五字。一九二二年冬，漢石經又有殘石出河南洛陽故城南漢太學舊址，馬衡有所採獲，編為漢石經集存，收儀禮殘文七十九條，約千字。據馬先生說，漢石經「蓋以大戴本為主，而以小戴校之」，其與今本文字略有出入。

東漢末，鄭玄始給儀禮作注。後漢書儒林傳董鈞傳云：「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鄭注雜採今古文，「若從今文，不從古文，……於注內疊出古文，……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賈公彥疏卷一）。此即所謂「鄭氏學」，也就是今本儀禮。

三國時，魏人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三國志魏書王朗傳附子王肅傳）。王肅亦混淆經今古文，但專與鄭玄作對。王肅之學行於西晉，今已不傳。東晉之後，仍通行鄭學。魏齊王芳正始年間（公元二四〇—二四八年），又以古文、篆、隸三體刻石經（酈道元水經注），今唯存零星殘石。

南北朝時期，經學分爲南學、北學，然「禮則同遵於鄭氏」（北史儒林傳），其中不乏專家。如南朝之雷次宗、鮑泉，北朝之徐遵明、熊安生、沈重等，皆名重一時。南朝齊之黃慶，撰有儀禮疏，賈公彥稱黃氏爲「齊之盛德」。

至隋，有李孟哲，也爲儀禮作過章疏，賈公彥稱李氏爲「隋日碩儒」。

唐高宗永徽年間（公元六五〇—六五五年），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賈公彥撰儀禮義疏。賈疏對南北朝的很多章疏，特別是黃慶、李孟哲二家之章疏，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並與四門助教李玄植等討論。賈疏雖被阮元評爲「文筆冗蔓，詞意鬱輻，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但它在儀禮的各種章疏中畢竟是較好的一種，所以流傳至今，成爲最權威的章疏。據舊唐書儒學傳，賈學亦承自鄭學。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八三三年）刻十二經，立於太學，中有儀禮十七卷。石經完工於開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世稱開成石經，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館。

北宋一代，治儀禮者蓋鮮。南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一一七二年），兩浙轉運判官曾逮命張淳校刊儀禮，淳因成儀禮識誤三卷，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阮元語）。又李如圭撰儀禮集釋十七卷，「全載鄭注，微遜嚴本」。又魏了翁撰儀禮要義，「專錄賈疏，多與單疏本合，有刪節而絕無改竄」。又朱熹及其弟子黃榦撰儀禮經傳通解，「全載鄭注，節錄賈疏」。宋學與唐學不同，務出新解。因朱熹名氣大，故明代刻儀禮者，多依通解。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序云：「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

舊。」又朱熹弟子楊復撰儀禮圖。

元、明兩代承宋學遺風，研究儀禮者蓋寡。元代敖繼公撰儀禮集說，「所載鄭注，多移易點竄，不足盡憑」。

清代乾、雍以後，經學復宗漢之樸學，治儀禮者甚多，且多影響較大。清初，顧炎武作九經誤字，以唐開成石經校明監本，多糾其謬。此後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盛世佐儀禮集編、程瑤田儀禮喪服足徵記、張惠言儀禮圖、凌廷堪禮經釋例等，皆一時名著。而胡培翬儀禮正義四十卷，尤爲重要，被認爲是儀禮學集大成的著作。

民國以來，治儀禮者日少。其中略可稱道者，武威簡本儀禮出土後，陳夢家曾作校記，沈文倬作禮漢簡異文釋，多有創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考古學家李濟提倡，台灣大學中文、考古兩系，曾組織部分學生，結合考古學、民俗學、古器物學，作「儀禮復原研究」，其成果出有儀禮復原研究叢刊，包括官室考、車馬考、樂器考、土喪禮墓葬研究等數種。

在宋代以前，儀禮經、注、疏皆分刻。南宋初，坊間欲省兩讀，各經合注與疏爲一書（十行本），然爾雅、儀禮兩種不在其內。儀禮注、疏合刻，一般認爲始於明正德間（公元一五〇六一—一五二一年）的陳鳳梧刻本，其後李元陽刊本、明崇禎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汲古閣毛氏刻本（通稱毛本）皆沿此本。這一系統的本子，「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所以譌脫較多，爲人詬病。

儀禮經文，今有唐石經在，可以取正。注最佳者爲宋嚴州單注本，明嘉靖時徐氏翻刻本「祖嚴本

而稍異」。嚴州本於清嘉慶乙亥（公元一八一五年）歸於吳縣黃丕烈，士禮居，黃氏有刻本，並有嚴本儀禮鄭氏注校錄，頗有可採。單疏本有宋景德間（公元一〇〇四—一〇〇七年）官刻本，清道光庚寅歲（公元一八三〇年），此本歸長洲汪士鐘，但已缺失卷三十二至三十七共六卷，又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聘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七篇缺失十三葉，此本後由汪氏翻刻。

清嘉慶丙寅歲（公元一八〇六年），江蘇江寧府知府張敦仁重刻儀禮注疏，經取正於唐開成石經，注用宋嚴州單注本，疏用顧千里所藏宋景德官本，所缺卷、葉用魏了翁儀禮要義補足，世稱張敦仁本。張本經、注、疏皆用善本，「祛數百年來承譌襲舛，以還唐、宋相傳之舊」（張氏序語），深得學界好評。

清嘉慶中（公元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年），著名學者、浙江巡撫阮元建詒經精舍，集天下學人作十三經校勘記。阮氏云儀禮一書「最爲難讀」，他雖「舊有校本」，此次仍命德清縣貢生徐養原，「詳列諸本異同」，成校勘記。所用之本，據阮氏說，「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實際上與張敦仁本取材相同。阮刻十三經注疏刊於嘉慶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一百八十年來，行用不衰，至今猶爲評價最好的本子。

我們這次校點儀禮，底本採用張敦仁本（北京圖書館藏本），這是因爲張本經、注、疏都採用當時最好的本子。張本也有一些不足。如卷三十冠禮記：「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嚴本鄭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徐本同，毛本無「者」字，張本誤從毛本。又如卷十鄉飲酒禮經：

「賓、介不與。」通解鄭注：「古文『與』爲『預』。」預黃刊嚴州本、徐本俱作「豫」，張本誤從通解。預、豫皆從予得聲，字固通用，但經用字應有一定體例，不能無故更改。雖然如此，張本比之明監本、毛本，仍然優點較多。阮本雖後出，但它採用的本子與張本同一來源，優劣亦約略相當。阮本糾正了張本的一些錯誤，如卷十二鄉射禮鄭注：「腓，膚理也，進理者謂前其本。」黃刊嚴州本、徐本皆作「前」，陳、閩本誤作「首」，張本承之，阮本加以糾正。不過我們仔細比較阮、張兩本，發現阮本實際上承自張本，既承襲了其優點，也承襲了其缺點。如卷二十六下覲禮經：「乘墨車。」單疏：「周禮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故知墨車大夫制也。」張本誤「孤乘」之「乘」爲「墨」，誤「墨車大夫制也」之「墨」爲「乘」，阮本同誤。又如卷三十八既夕禮經：「加抗席，三。」鄭注：「席，所以禦塵。」單疏：「云『席，所以禦塵』者，上云抗木『所以禦土』，此抗席云『禦塵』者，此二者在壙口以承土、塵。但抗木在上，故云『禦土』；抗席在下，故云『禦塵』。」張本誤下「禦土」爲「禦塵」，與下句無別，阮本不察而搬用。實際上經云「抗木橫三縮二」，注：「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明是「土」字，且單疏作「土」，即是明證。阮本還有一些其他不足。鑒於此，我們未以阮本作底本。

張本有的地方與唐石經、嚴州本、單疏本不合，而明顯錯誤者，我們逕加改正。如卷四士昏禮經「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唐石經、黃刊嚴州本皆如此，張本涉下句誤作「壻以几姆加景，乃驅不受」；又如卷一士冠禮經「宰自右少退，致命」，嚴本注「自，由也」，徐本同，張本「由」誤作「猶」；又卷二「乃宿賓，……」條下單疏引特牲禮經云「前期三日宿尸」，阮校云陳本、要義同，而張本「三」作

「二」，查特牲饋食禮，亦作「三」；又如卷二士冠禮單疏引詩云「總角丱兮」，張本誤「丱」爲「卅」。凡屬此類情況，或出校，或不出校，而皆改字。

對唐石經、嚴州本、單疏本的錯誤，我們採取慎重的態度，分別不同情況作不同處理。如卷二士冠禮經「實勺、觶、角、柶」，嚴本鄭注「勺，尊升」，單疏引注同。此「升」字阮校引金曰追說，以爲是「斗」字之誤，引少牢疏「鬯水有料」，「料」即「斗」。今按金說是，詩大雅行葦「酌以大斗」，正以斗爲酌酒器。古文字升作彳，斗作彳，極易混淆。我們據金說改注及疏，但在校記中說明理由及未改前原貌。但對異文難定其是非者，或皆可通者，或情況複雜者，皆保持原貌，輕易不作改動。比如卷二十二喪服大功九月章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鄭玄已疑傳文有錯簡，賈疏疑「下言」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共十一字非傳文，後之學者如阮元、胡培翬等多以爲「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乃鄭注誤入傳文，胡氏儀禮正義還附列移正後的經、傳。武威簡甲、乙本服傳無「下言」以下二十一字，足證其確爲鄭注誤入。但簡本經、傳文字排列順序與唐石經以後諸本同，看來並無錯簡。對這類極其複雜的情況，我們只作校記，正文一概不動。

阮本各卷後附校勘記，阮校詳列各本異同，有的還以按語的形式分析其正誤，這些對儀禮研究都極爲有用。阮校也有一些不足，如有的地方有疏漏；有的地方承張敦仁本之誤而未改；有的按語